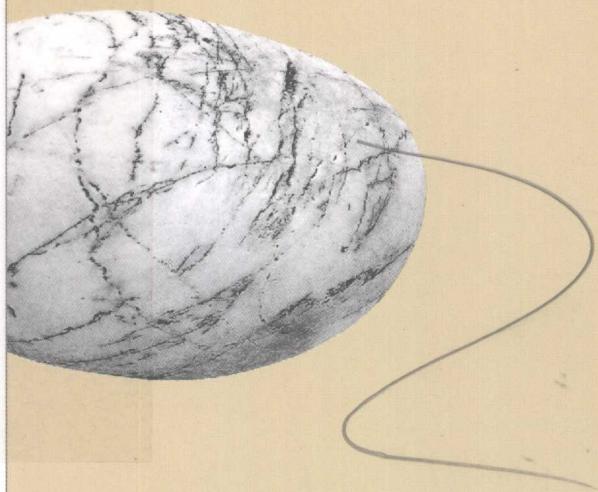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

Specters of Derrida

德里达的幽灵

陆扬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B565. 59/26

2008

本书承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

Specters of Derrida

德里达的幽灵

陆扬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里达的幽灵/陆扬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

ISBN 978-7-307-05650-3

I. 德… II. 陆… III. 德里达, Y. (1930~)—哲学思想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959 号

责任编辑: 柴 艺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詹锦玲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875 字数: 385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650-3/B · 179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主编 彭富春

在新世纪里，思想的人们都有一个梦想，让思想本身充满创造力或创新力。这种梦想其实是源于对于当代思想状况的焦虑。为什么？在一个计算和图像的时代里，事物已不需要思想，人们也不愿和不能去思想。姑且对此不论，学术和思想之争也让思想自身处于一个困境之中。思想要么被学术所取代，成为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么背离了学术，成为了空洞的和浮夸的语辞的生产。总之，一种真正有创造力的思想仍在期待之中。

但思想从哪里获得它自身的创造力？任何一种有创造力的思想都表明自身是新的，不是旧的，是新与旧的区分和分离。但任何一种有创造性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出的，而是基于已有的传统。因此，所谓思想的创造必须是对于历史的追忆和再思。只有走进传统，才能走出传统；只有回到旧的，才能跃向新的。

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中国的思想者来说，他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自身所属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儒家、道家和禅宗所构成的思想的历史。过去人们力图否定它，拒绝它和抛弃它，认为它束缚了人的存在，制约了现实的发展和进步。但现在人们试图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藏。特别是在“国学热”当中，传统思想得到了再度的肯定。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任何简单的否定和肯定都不是适宜的态度。一种超出了肯定和否定立场的思想姿态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区分，也就是揭示出哪些是死的、哪些是活的。惟有活的思想才能激活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态度又始终相关于对于西方思想的态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和西方思想的

相遇和撞击。当代全球化的浪潮更使中西思想产生了更密切的对话。这导致了中西思想的比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所谓比较不仅只是揭示相同点，而且也是分辨差异处。甚至可以说，差异比相同是更为重要的。正是在差异处，我们划分了中西思想的边界。由此可以确定，哪些是中国思想已思考的，哪些是中国思想尚未思考的。当思想意识到自身的边界之后，它才有可能越过它，开辟新的领域。

思想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也许是思想自身永恒的争论，无穷无尽。但争论的聚集地是我们的当代现实。离开了当代现实，一切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都是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都是为了现实世界的争论。思想借助于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参与现实世界的争论：何为是？何为非？由此，思想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亦即在何种程度上是有创造力的。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正是这种思想争论中的一种声音。

是为序。

2007年12月26日于武汉大学

陆 扬

文学博士，先后供职广西师大中文系、华中师大文学院、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南开大学哲学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主要有《精神分析文论》、《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后现代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导论》（合著）、《死亡美学》等。译著主要有《论解构》、《呼啸山庄》、《重构美学》（合译）、《第三空间》（合译）等。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

■ 自然美的哲学基础 刘成纪 著

■ 德里达的幽灵 陆 扬 著

■ 回到思的事情 陈春文 著

追思德里达

（代序）

2004年10月8日深夜，当代法国，或者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肯定是知名度最高的哲学家德里达因胰腺癌逝世巴黎。消息传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目光犀利、寡言少语、谈起哲学便滔滔不绝的解构主义之父，如何就在74岁的好年纪，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国内较早系统介绍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学者，作为在巴黎拜访过他的客人和在上海接待过他的主人，我所感受的痛惜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当代法国的思想界，德里达或许算不上泰斗。泰斗是今年已96岁高龄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2000年我去法兰西学院拜访他，老人笑着说，他的结构主义在年轻一代的思想家看来，早就过时啦。“年轻一代的思想家”首当其冲是当年向他发难的德里达，可是列维-斯特劳斯说这话的时候，德里达都已经年届70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为倡导破除迷信，反权威和反传统，很长时间被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他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都没有最终把他很好地接纳下来。1982年德里达告别巴黎高师这个哲学家的摇篮，转而供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已名盖天下，引得满世界都在言必称解构的德里达，居然还不是正教授。巴黎高师的解释是那时候哲学系没有新增教授名额，可是德里达走了没有多久，名额就下来了。那是纯属巧合吗？或许吧。

但是没有疑问以反传统起步的解构主义，今天本身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核心说到底是批判、扬弃而不是人云亦云，而这正是启蒙运动的传统。德里达去世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致辞说，因为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这并不言过

其实。2000年在巴黎，我和复旦大学的莫伟民一同去听德里达在大学城海涅厅所做的一次讲演，厅里几乎水泄不通，1/3以上是外国人面孔。我们去得早些，看到主人站在讲演厅外的草地上，迎来了自己开着一辆白色两厢轿车过来的德里达。走上前去，发现德里达那辆太为普通的坐骑，右前端居然还给稍稍撞瘪了一块。联想到国内轿车们的豪华气派，当时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之前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拜访德里达，正值他在办公室里给传媒录完一档节目之后，他送给我围绕1994年他在美国维拉诺瓦大学讲演编出的一部文集《核桃壳里论解构》（*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说起他对中国文化景慕有年，已有听闻，但是对于中国大陆，那还真是很神秘啊。

神秘很快就破解了。为加深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2001年由法国政府出资，促成了德里达期盼已久的中国大陆行。到上海时，法国驻上海总领馆为表郑重，特意设了一次午宴为德里达接风。上海的客人里有复旦大学的朱立元、吴中杰和我，以及时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的陈超南，还有久为法国人心仪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态度是人所周知的。他把柏拉图一路而下的西方思想称做“在场的形而上学”，它的另一个别称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当陈超南问起他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时，德里达说，他对中国文化一直非常关心，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是他兴趣最大的是汉字的文化，因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那样对声音亦步亦趋，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样来看哲学的话，德里达说，他觉得哲学是源出希腊的东西，它是西方的传统。哲学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植根发芽，开花结果，探究起来一定是别开洞天的。而且，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呢？他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

此言一出，不说满座哗然，大家终究还是愣了一愣。有人谈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叫做哲学的东西，可是对于超越的追求，相较西方并不逊色。王元化解释说，如果说哲学的特性是逻辑和体系，那么在两汉之前，中国文化或许谈不上哲学。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比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得名于该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头两个字。但是汉代以后佛教传入，到魏晋

印度佛教的因明学已为士大夫们相当熟悉，后来的著述中，逻辑和体系都已不在话下。这其实是委婉回答了德里达的疑问。

德里达看见众人误解了他的意思，赶紧声明说，他讲中国没有哲学，绝不是说中国和西方的思想谁高谁下的意思。他是觉得西方哲学的根子在于本体论的传统，要穷究逻各斯，这完全是希腊的土产。真的，即使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叫做哲学，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伟大的传统不会因为名称的不同而有丝毫贬值。再者，今天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军事的文化，都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而已经交织渗透了西方的文化，正像今天西方的文化里边，也交织渗透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一样需要西方的解构，一如西方之需要中国。

“解构”一词每每被人视为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代名词，这其实是德里达经常苦恼的事情。他发表声明澄清，亦是不计其数。就德里达紧接着在上海社科院给“解构”一语所作的说明来看，无疑是相当正面的。德里达解释说，“解构”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贬义词，解构就是把现成的、既定的结构解开，就是质疑、分析和批判，所以它和历史上的批判传统一脉相承。德里达举譬“解构”早有先驱，如果说其中的海德格尔还不在于话下，那么当德里达把黑格尔的“扬弃”和马丁·路德质疑中世纪神学一并列入这个名单，那么无论如何都使人对“解构”刮目相看了。

德里达曾经把真理、理性、逻各斯、本原等通通发落到神话一类，强调纯而又纯的真理从来就不存在，真理自身总是先已包含了谬误，而正是谬误决定了真理成其为真理。巴黎当年拉动后结构主义的三驾马车拉康、福柯、德里达中，德里达曾经讽刺拉康是“真理供应商”，指责福柯批评理性却对古典希腊的理性情有独钟。但是我们看晚年的德里达，解构的术语和理路依旧，旨趣已大不相同。他会说希腊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只是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系统里，变成了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所以解构哲学就是反对学院派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作风，回归具有开放精神的希腊传统。他后期著作中一再把公正或者说正义高高标举出来，反复强调公正不是法律甚至不是人权，法律需要修正因为它并不完美，而

公正不需要修正，因为它是绝对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是世人翘首以盼的救世主。他进而把解构喻为公正，声称一切都可以解构，惟独解构自身不能解构，因为它就是公正自身。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很纳闷当年摧枯拉朽，解构传统不遗余力的德里达，是不是到后来自己陷入了他曾经不齿的乌托邦里面？这或许也是在国内一些学人看来，德里达在变得“保守”起来的缘由。

但是“保守”毋宁说是体现了哲学家日益意识到的社会道义和责任。仅就德里达近年的著作目录来看，如《电视透视》（1996）、《信仰与知识》（1996）、《论款待》（1997）、《赐予死亡》（1999）、《盲人的记忆》（1999）、《论触觉》（2000）和《无条件的大学》（2001）等，他的解构工程很显然早已不是天马行空，玄之又玄，如以前左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一头钻进文字游戏而忽视世界的不公。所以我们不奇怪会看到在《往返莫斯科》和《马克思的幽灵》这两本最明显见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中，德里达会明确宣布，解构主义是运行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挟带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究其原因，德里达则毫不犹豫地断言，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没有疑问这里德里达看中的是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假如我们认可德里达本人的阐释：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就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假如我们认可希拉克总统的评价，德里达是为世界贡献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解构主义的继承人？这未必是夸张的。

导 言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思想界有一股离经叛道、名之曰“解构”或者说“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思潮在悄悄崛起。数年之间，很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激起反响，继而迅成燎原之势，席卷欧美，波及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在内的文化研究的每一个领域。迄至今日，这一由雅克·德里达开创的新理论，无论人们或是深有同感，或是坚持视之为洪水猛兽，有目共睹的是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已经深深铸入并不仅仅是西方学界的思维模式和方式了。

1993 年作者在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解构主义的影响还主要见于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是一个喜新厌旧的领域，各类新潮理论在这里发现了最好的实验场地，所以风起云涌，潮来潮去，各领风骚若干年。当时，正值新历史主义异军突起，大有取代解构主义风头的势头。在这一背景下作者给《文艺报》写了一篇题为《解构主义死了？》的文章，内容大致是：因为做过德里达的博士论文，又写过一些关于解构的文章，来到此间这个傍着密西西比河的人文学院后，留意起解构主义的动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踩着吱吱的积雪，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向一位法语老师打听过德里达的近况。“德里达吗？”这位曾经听过德里达讲演，却和许多听众一样，未能坚持到终场的助理教授说：“是很难懂的，我想他的理论，在这个国家是快要死了。”

据说死亡是深深笼罩着德里达的一片阴影。把德里达的好几本书译成了英文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蓓琪·加缪夫（Peggy Kamuf）断言德里达的死亡情结并非心理症候，而是一种哲学思考。但是德里达本人的解释更加直截了当。每一分钟，他说，他都会预感到下一

个钟点他会死去；每一次驱车回家，他都有一种仿似坐在影院之中的幻觉，眼看着自己的车被撞得粉碎，但闻邻座语：这人刚才穿过十字路口，可是现在……现在我们不会奇怪德里达的“死亡宣言”：所有他的文字都关涉着死亡。倘使他有一个目标，德里达说，那么这个目标便是接受死亡。但是，解构主义死了吗？

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虽然，以《镜与灯》一书为我国读者熟悉的老资格批评家 M. 艾伯拉姆斯，宣称解构主义在 90 年代已逊于他本人情有独钟的新历史主义，让出了先锋批评的第一把交椅，但实际上，由于解构主义在大洋彼岸的它的这个第二故乡，早已远不囿于“学院式游戏”，以至不但在课堂上，“解构”一语今已成了“分析”的同义词。甚至在报刊上，还令人瞠目结舌地刊出了“解构主义时装”，诸如短缺一袖，理应平整处偏偏是狗牙般狰狞模样，等等。在这等背景下，要来验证解构主义之“死”殊非易事。首先德里达本人就不同意。只要还有人来研究符号，他说，那么想一想如今关涉着解构的这许多出版物、学术会议，以及各式人等，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相反。德里达未必是夸张其辞。据统计，德里达的名字早在 1990 年就至少已经出现在 54 个书名里。这个数字后来显然一直在增长。这也许正应了批评家和美学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的一个比喻：解构主义死了，就像封建主义死了，它无所不在！费希可不是“解构主义者”。

曾经给萨特作传的德里达的远房侄女安妮，称德里达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这派极富文学色彩的法国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但是与萨特不同，德里达与妻子玛格丽特是在巴黎郊区生活和写作，驱车往返城内的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不同的还有德里达既非在巴黎，又非在外省，而是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度过凄凄惶惶的童年。为母亲的谢世，德里达当时写过一篇自传性文章，其中回忆说，他这个犹太人的孩子，幼年给人的印象，是常常“无缘无故地哭泣”。果真“无缘无故”吗？德里达说，在他来到这个世上才 10 个月，他的一个哥哥死在了襁褓之中。而 10 年之后，他的一个弟弟又因病夭折。所以每一次他有病患，母亲总是心惊胆战，战战兢兢。生命是脆弱的，对此这位法国哲学家的感受，恐怕比常人要

深切得多。

很难说不是解构主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特点——德里达已有二十余部著作被译成了英文，在美国这一先锋理论之受青睐，没有人怀疑远甚过了他的故土法国——70年代以来，德里达每年都要飞过大洋，来与他的美国盟友切磋解构之道。德里达的英语据当时美国报纸的描写是讲得不算纯熟却还地道，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90年代初叶他在纽约大学，连续两年以“秘密”为题主持研究生班，德里达的逻辑是“秘密”必须首先公开，然后才能掩蔽起来。这个解构主义的逻辑，与传统的秘密概念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德里达开出的阅读书目，虽然照例少不了海德格尔，亦开始逐渐伸向文学，例如麦尔维尔的小说。据载有一次德里达从弗洛伊德、拉康、小说家艾伦·坡，以及胡塞尔、黑格尔到海德格尔滔滔不绝一路讲下来后，一位专程从耶鲁大学赶来的研究生——注意耶鲁大学曾经是解构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大本营——可怜巴巴地对他的邻座说：“我大概听懂了1/10。”但是，解构主义死了吗？

早在1987年，已故的耶鲁大学英语教授保罗·德曼，被揭出年轻时曾为纳粹报纸撰稿后，解构主义一时就成了众矢之的。虽然，德里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适是排犹太主义的受害者，且数十年后，方始营筑起他的解构工程。另一方面，所谓的解构主义阅读，即专门从文本中搜索矛盾，几乎是千篇一律地推翻定论，不惜作种种异想天开式的歪解曲解，也绝非可以畅通无阻。在传统阵营看来，这样做虽不是说刻意引人走火入魔，至少毫无意义。如艾伯拉姆斯指责德里达是把语言化解为密不透风的回音室内相互碰撞的符号，同外部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小说家厄普代克则认为德里达是在鼓吹“艺术中没有健康的東西”，对解构主义亦极不以为然。即使是左翼，虽然德里达自喻为民主左派，炮火也未必稍缓。德里达被认为是诱人沉湎于永远没有结果的玄想，而无视世界的不公。德里达的回答是，这个世界果真像来自左右翼的批评所希望的那样清楚明白吗？要之，政治和道德的模式必将清一色地齐整而没有冲突。但诚如这世界云谲波诡一如我们都能看到的那样，艺术又如何

能够幸免？对此德里达说，他的解构工程，不应被简化为一种方法，甚至一种理论，解构是一种经验，它的一部分属于历史的结构，既远早诞生于他的学院解构主义，也势将以其他的名称延续下去。应当说德里达没有说错，今天，很少有人怀疑以反传统为己任的解构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毕竟，无坚不摧的是传统而不是反传统。

回顾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一开始解构理论或者说解构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英国文学批评家克里斯多弗·诺里斯在其《解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劈头援引了已故美国解构运动中坚人物保罗·德曼的一段话：

批评与文学（两者的差异只是假象）被指责（或者特别尊奉）为永远是最苛刻，因而也是最不可靠的语言，而人类就以这种语言来命名和改变自身。^①

德曼似乎有意强调批评和文学应当一视同仁，不可被分割为两块自立门户的阵地，这本来也是解构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但上面的话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意味：文学与批评的分野何以只是“假象”？另怎见得某一种语言一面以“苛刻”蜚声，一面又是知识或是说认识的“最不可靠的”渊源？如此等等，诺里斯感叹道，纵是你读烂文本，或者将它纳入任何一种哲学的或宗教的体系中联想开去，欲理清个中的逻辑关系，也是枉然。而据诺里斯说，这就是典型的解构主义思维模式。

还有说得更绝的。任教于坎特伯雷大学哲学系的大卫·诺维兹，在他所写的《隐喻、德里达和戴维森》一文中，干脆就说，任何试图揭示解构的本质，试图客观地来描述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努力，都注定立时便将陷入窘境，因为说来自相矛盾，就解构的本质而言，这类客观描述，根本就没有可能。这是因为：

① 诺里斯：《解构：理论与实践》（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Routledge, 1982, p. 2.

认为语言能被用来传递解构的基本性质，或者哪怕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乃是认同被德里达不屑一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神话，即相信语言是由非语言的实在所制导和统辖，并且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把握这些实在的真实性质。^①

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发糊涂。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晦涩艰深的理论后面那个活生生的人。1982年，当《新观察者》记者采访德里达时，这位业已驰名大西洋两岸的哲学和文学界的传奇人物，用这样的话迎接了他的客人：“怎么，要我告诉你诸如‘我生在阿尔及利亚郊区的埃尔比亚，一个已被同化的小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然后又如何如何吗？行个方便，恕我不能从命。”^②几个月前，他曾因莫名其妙的携带毒品罪，遭捷克斯洛伐克警方逮捕，时当他访学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地，适在撰写题为《法律面前》的著名文章——标题本身成了对他自身命运的绝妙讽刺。

德里达1930年生于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据说，德里达孩提时代最早的记忆，便是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排犹之风甚嚣尘上的年代。这个难忘的印记与他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布拉格经历，虽然未必能够“解释”他那些叫大多数人目瞪口呆的文字，当有助于我们理解笔端流出这些文字的思想家，何以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其一便是打破哲学自在自为，无涉政治和日常经验的神话。19岁获学士学位后，德里达旋即赴法国，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法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在这里早年的德里达明显受了萨特和加缪这两位存在主义大家的影响，很难说他是否由此即开始了从哲学中读出

① 大卫·诺维兹：《隐喻、德里达和戴维森》，见《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David Novitz, "Metaphor, Derrida and Davidson,"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85, Winter, p. 103.

② 见诺里斯：《德里达》（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文学，从文学中生发哲学的一贯阅读风格。他师从黑格尔学者让·希波里特（J. Hyppolite），潜心攻读了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也读了本国小说家巴塔耶（Bataille）和布朗肖（Blanchot）等人的作品。事实上这些人的文字日后都对他产生了有迹可循的影响。他的硕士论文《记忆》，写的就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结构和发生。

1957年开始着手的博士论文《文学对象的理式》，同样是受了现象学美学的启发。这篇论文他一直没有做完，答辩一推再推，直到1980年他50岁的时候，才同意答辩，并成功通过，该论文的英文题目是：*The Time of a Thesis: Punctuations*。但正是通过细读胡塞尔，德里达自称使他察觉到现象学方法中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的问题，如对文字的歧视，对哲学的文学性估计不足的缺陷，等等。这使他终于在1962年，时当在巴黎大学任教两年之后，译出胡塞尔写于1936年的一本小书《几何学的起源》，并作了篇幅超过原文的长序。这是德里达出版的第一部力作。洋洋洒洒的引论中，德里达谈到胡塞尔方法论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每到胡塞尔求诸形形色色的“无以还原”的隐喻来作说明时，总有些出人意表的“妙语”出现。很显然这正是文学而不是哲学的特征。这使他一方面对胡塞尔作了与正统理解迥然不同的解释，一方面有感于语词本义和隐喻义殊难清晰的复杂关系，也使他开始来质疑哲学话语的基本假设。几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最恒久的兴趣，那是甚至在我喜欢上哲学之前即已发生的，应当说，如果可能的话，是对文学，对叫做文学的那类文字的兴趣。”^①但切莫忘记德里达对哲学的一往情深，同样据他自己说，他所选择的哲学，虽然后来被证明是一门命乖运蹇的学科，却依然是他的挚爱所在。

1957年，德里达随法国军队赴爆发独立战争的阿尔及利亚服役，教随军子弟法语和英语。1960年回法国后在索邦即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哲学。1965年，德里达就职于他的母校巴黎高等师

^① 蒙特伏瓦编：《今日法国哲学》（Alan Monterfiore ed. *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35.